

從澳門看歐洲與中國*

Etienne Reuter **

上星期，在布魯塞爾召開了歐洲共同體與中國聯合會年會。該聯合會是依據十年前歐洲共同體與中國簽訂之商業與合作協議而成立的。從歐洲的角度看，我想強調一個對歐洲最為重要的事實。一九九五年很可能將是值得回憶的“中國年”：國家主席江澤民即將出訪紐約，參加聯合國五十周年紀念大會；總理李鵬正在拉丁美洲訪問；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錢其琛最近十天也在倫敦、盧森堡、都柏林、莫斯科和紐約穿梭訪問。這一年，中國與幾個國家都有爭吵，核試驗和國際婦女大會的組織方式受到全球的關注和非議。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輕視中國的影響力。亞洲國家和歐洲國家都正在尋求發展經濟，而這種發展必須以地區安全為前提，但地區的安全由於俄羅斯和中國發生了重大變革而出現了新的不確定性。

今年，歐盟慶祝和中國於1985年簽訂商業與合作協議十周年。我們還記得二十年前我們剛剛與中國開始有外交接觸，當時聯合會的副會長，Sir Christopher Soames（後來是 Lord Soames）帶領第一個代表團訪問北京。所有本星期在布魯塞爾開會的人都會記得這一點。中國代表團團長，吳儀女士在中國經濟界人士的陪同下出席了會議。而在周末，在布魯塞爾也組織了一次有關歐洲與中國貿易問題的特別論壇，五百多人參加了該論壇。

* 本文為作者參加由澳門法學會於九五年十月二十一日舉辦之《歐共體亞太商業及科技關係以及其帶來的經濟與社會影響》會議論文。

** 歐盟委員會駐香港代表

今年七月份，歐洲委員會採用了一個有關與中國關係的總政策的新計劃。該計劃意味着歐洲更靠近中國。同時在雙方關係的歷史上翻開了新的一頁，結束了天安門大屠殺之後，歐盟所隨即採取的制裁政策。在理性與現實的考慮之下，我們的戰略是在國際問題上推動中國的發展，同時保障歐洲在中國市場的貿易機會。

負責中國與歐洲關係的使者，Si r. Leon Brittain 講到，在制訂該新計劃的時候，“我們必須避免中國選擇孤立發展的道路，歐洲需要根據實用的原則支持中國的改革”。這番話揭示了新政策的精神。在這個寶貴的時刻，我們為甚麼需要這樣一個新政策呢？中國的冒起正好解釋了這一點。一百九十年前，當拿破崙在埃及扎營，在金字塔的陰影下休息的時候，寫下了“當中國醒來的時候，世界將為之震動”。毫無疑問，拿破崙是一位有預見的偉人。一九九五年，中國開始冒起，但這並不意味着，世界必須為之震動，但是我們必須同中國展開富有建設性的對話。

目前，在絕對的數字參數上，中國的實際購買力等同於日本。預計到2020年中國將變成世界上第一經濟大國。軍事上，中國是一個核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軍事製造商和出口商之一，在最近幾個月，中國在太平洋和南中國海地區的影響亦越來越大。

儘管我們每天都看到中國的領導人正着手鞏固他們的地位，以及向我們顯示他們已經鞏固後鄧時期的政權，但是任何人都無法肯定在將來幾年或者將來幾個月，中國將會發生甚麼事？我認為這使得我們更應多與中國進行建設性對話。政治上，必須使得中國能參與處理國際社會的多項事務，說服中國承擔責任，與其他國家進行合作以解決地區爭端，並阻止其進行核擴散。

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政策並非基於歐盟已放棄對中國大陸人權狀況的憂慮，亦非表明我們已經忘記1989年所發生的事情。但是，我們看到，自從鄧小平於1978年開始實行逐步對外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社會已經發生巨大變化，經濟上亦進行一系列改革。這一進程並非一帆風順，將來亦可能出現某些更多的停頓甚至倒退。

我們知道在中國仍然有侵犯人權的狀況存在，我們亦堅決反對這種侵犯。歐共體在此領域將透過同中國政府對話及討論來促進其加以改善。歐洲領導人將利用一切及任何一個可能的機會與中國領導人探討以求達到共識。為此，我們開始正式領域的實際合作以協助中國發展及完善其法律制度及司法制度。事實上，這不僅對更好地保護私人的權利是必要的，同時對於造就一個發展貿易及交流的有利環境亦是一個基本前提，在該種環境中，OECD（經濟合作與開發組織）伙伴會感到更為自如。

在經濟發展方面，歐盟相信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已不可逆轉。但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我們完全承認之一個現實。這種認同很自然地包括上述的一些中國特色，而正因為此，歐洲及其他西方國家理解及接受該獨特性時會面臨一些困難。

實際上，在當今的中國，國家對經濟實行的控制比以前少得多。十年前實行的計劃經濟，國家控制百分之八十的工業生產，目前則不足15%，對價格的控制也逐步減少，其中的公共因素被削減，儘管在將近50%的經濟中這種控制依然有所表現。中國的經濟繼續有12%的年增長。其工業產值年增長20%，對外貿易額在最近十年增長十倍以上而對外商業交往亦大大擴展。除此之外，它還擁有相當可觀的外匯儲備，而通貨膨脹亦受到了控制。

很明顯，我們不能對經濟迅速發展中出現的問題視而不見。我們知道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的差異日益擴大，貧富差別日益懸殊，尤其在農村及新近富裕起來的城市。但是，我們專家能做的研究指出中國政府將有能力解決這些問題。

通過一些數字，我們可以驗證中國最近的經濟發展對於改善與歐盟商業關係的重要性。從1980年起，雙方的商業貿易增長了十四倍，在開始的時候，我們還有順差，而現在，我們卻已有了一千億港元的貿易逆差，而美國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逆差比我們還多。

隨着中國加速經濟改革，我們之間的商業關係得到迅速的發展，從一九九五年初開始，中國已經一躍成為向歐盟出口的第四大輸出國及第四大商業供應商（僅次於美國、日本和瑞士）。

在一九九三年，雙邊貿易達到三百零八億歐洲貨幣單位（約為三千億港幣），一九九四年增加到三百七十億歐洲貨幣單位（等於三千七百億港幣），預計今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將達到一千三百億港幣。中國在歐洲的投資雖然只有一億六千萬美元，但是，中國投資在不斷增長。而現在歐洲在中國的投資僅約為二十四億美元，遠不如香港和台灣在中國的投資，也不及美國和日本。在歐盟的成員國中，法國、英國、德國和意大利是較大的投資者。

可能，我們對於新的對華政策的最大顧慮是幫助中國盡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可能性（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另外，有關顧慮也在上星期的布魯塞爾的年會上提及過。在過去的一年，聯合會在雙方的貿易中擔當着重要的角色。其實，我們早就有一份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計劃的議定書。去年 Leon Brittan 訪問北京時曾經建議，只要中國立即承擔成員國的大多數義務，只有部分條件允許在稍後的階段執行，那麼可即刻成為成員國。這種政策意味着我們很好的理解中國的實際情況，因為在中國存在着自身發展的特點，在許多重要的方面也存在着有別於真正的市場經濟的特點。

現在，歐盟將堅持使中國履行那些最基本的“入關”條件使得符合該組織訂立之國際規範，Sir. Leon Brittan 指出了具戰略意義的其中七個方面，也就是說，降低關稅使其平均值不超過主要工業化國家平均關稅的二倍的水平。我們還要求中國開放服務市場，放棄對外貿易的壟斷，加入有關航空與國際調解的多邊協議。總體來說，中國必須重視世貿組織的規範，制訂有關的工業政策。這些政策主要指有關調整津貼，公共部門的所有權，官方定價，國有商業和出口之關稅權利等等。我們也很高興地看到與知識產權的很多問題得到了很好的改善。為了能夠保護歐洲的商業利益，歐盟還加快建立一套商業活動的保護及監督條款的制度。當中國參加所有在馬拉喀什 (Marraquexe) 舉行的烏拉圭回合談判，並簽署了所有的文件的時候，中國很清楚有關的問題。在世貿組織裡，中國僅被賦予觀察家的身份。但是，我相信現在是推動解決這些問題的合適時機，儘管我們不能忘記這些問題的解決有一個過程，這也意味問題很可能在一九九六年底才能解決，而不是今年。

我還想從我們的角度，向大家介紹另一個存在於歐盟與中國關係中的合作層面。而最主要的一點又是有關分擔人類共同關心的問題上所應承擔的責任。有一次，我與一位中國官員交談時，該位官員反對那些他稱之為歐洲對中國內政進行政治干預，我對他說：“發生在一個具有十三億人口的國家的任何事情，很自然地，對整個世界都

會有影響，會引起世界關注”。現在，中國是人口大國，是能源方面沉重的消費者，同時亦是一個最受污染的國家之一。所以很自然地，我們必須共同努力解決一切與我們的星球將來有關的問題：環境、毒品、衛生問題，例如：愛滋病和癌病。

除了上述的問題之外，聯合會還關注着一些具體問題：尋求在中國建立商業資訊中心，試圖擴展與中國上海政府合辦並取得卓越成就的商業學校；積極推動文化合作，尤其是加強歐洲大學和中國大學之間的聯繫，所有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樣不僅可以加深彼此之相互了解，而且可以擴大積極影響。現在我向大家介紹一些很有價值的統計資料——目前，有三萬名中國留學生在美國，而在歐洲只有六千名中國學生，的確這種情況很令人擔心。

最後，我想強調指出，我們在六月份訂立的政策的新方向，聯合會第一次頒佈有關文件以調整雙方關係，確定了香港和澳門對歐洲的重要性。聯合會談到主權移交給中國，同時也很清楚地強調了歐盟的立場。我們支持完整履行中國與英國、中國與葡萄牙之間簽訂的聯合聲明（英國與葡萄牙均為歐盟成員國）。我們相信中國也會賦予根據聯合聲明而成立的未來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我們希望我們的這種立場可以獲得歐洲部長委員會在下個月召開的會議的支持。

任可一個人都不能忘記歐洲在亞洲有很重要的利益所在。一九九二年，我們與澳門簽訂的商業與合作協議，根據該協議我們已完成一些活動，雖然很少但意義深遠，這包括職業培訓，高等教育，也許更為重要的是保留歷史遺產。澳門和香港是歐盟重要的貿易伙伴。事實上，這兩個地區作為中國對外的門戶擔當着極重要的作用。實際上，中國與歐洲貿易的百分之五十是經由香港和澳門中轉。港澳亦被視為歐洲在亞太地區商業活動的基地。香港應該繼續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合適的模式和工具。這個城市在中國保留了很多的投資，並擁有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二十五。

當談到本地區商界，特別是提到港澳本地的歐洲商人聯合會，有一樣東西是很清楚的：歐洲人認為港澳是與中國發展商業活動最理想的工具。商業環境的維護，特別是法治，公共管理的質素以及基礎設施的完善與有效將是未來幾年最基本及最為重要的東西。

我們的長期政策一直得到中國的歡迎，例如，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MFTEC）歐洲事務負責人 He Xiahao 曾說過歐盟計劃“是一個很有遠見的文件”。吳儀女士在布魯塞爾也說，“我們隨時準備和歐盟建立長期穩定的貿易關係”，現在大家都很清楚香港和澳門在雙方的商業關係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擔當特別的作用。歐盟正為此而努力。